

第四章

中立的國家、父權的眼睛

—國家發展需求與父權的衝突與協調

一胎化政策在執行的過程中不免要面對父權的障礙，而國家雖然一開始並未設想到它的存在與影響，但是也必須要加以解決。本章以一胎化政策的輔助政策「關愛女孩」與「幸福工程」為例，說明國家的發展需求與文化上的父權需求之間如何衝突，又如何協調。中共在解釋如何提昇婦女地位，而女嬰又是為什麼不被偏好時，正反映出中共是如何在生產力上以男性的標準在看待女性，如何解釋女性與男性相比的不足，並將其本質化。

性別選擇性生育的許多過程都是發生在檯面下的，我們雖然能夠指出性別人口比例上的龐大落差²⁶，但是並沒有足夠的資料來瞭解在每一扇門背後，私領域之內所發生的事。他們究竟是怎麼選擇要不要生女孩，誰和誰有過激烈的爭辯，在這之中國家的需求佔了比較大的影響力，抑或是父權的膨脹掌握住大部分的局面？這些都需要更進一步的田野研究來加以勾勒成型，但是即便目前我們還沒有足夠相關的資料，但是依然可以藉由一胎化政策自身的演變來觀察出上述問題是否存在。政策依循政策動機加以鋪陳，而修正則是因為現實社會環境來加以改正，在逐漸摸索出一條政策動機與現實環境可以相謀合的過程中，我們藉由政策的改變而發掘出一些背後的意義。

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一胎化政策針對性別問題而做出的補強最直接的便是

²⁶至 2005 年為止，中國總人口數為十三億七百五十六萬人，其中男性佔了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一點五三（六億七千三百零九萬人），女性佔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四十八點四七（六億三千三百一十九萬人），性別比為 106.30。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5 年全國 1% 人口抽樣調查主要資料公報」，[中國人口資訊網](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gb_detail.asp?id=6543)。
<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gb_detail.asp?id=6543>

1995 年啓動的「幸福工程」以及 2003 年開始的「關愛女孩」活動，這兩項活動都呈現出了一個共同點，它們都企圖從經濟生活的改善來提昇婦女的地位，從而達到一胎化政策性別中立的少生少育目的。藉由這樣的實質性補助與宣導，一胎化政策對於性別的理論也自我形成了一個迴圈，除了不斷的肯定了經濟與女性之間的正向關聯之外，也形成了一個生產與再生產關係的論述。因為國家認為，部份地區（例如農村）選擇生育男孩的原因除了傳統文化的考量之外，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爲了生產力的因素，在體力上的勞動女孩的生產力不如男孩，因此必須藉由國家的力量增加生育女孩的誘因，提高女性的經濟地位，男女兩性才能夠在一個比較相近的基礎上，也才能夠減少性別選擇性生育的發生。然而，這樣的論述是否能夠確立？生產與再生產之間是否有如此必然的影響？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的去加以論證，甚至，當我們宣稱女性必須提高自身的生產力或是經濟地位才能夠免於歧視時，這是否是將歧視的行爲中性化，將過去的性別歧視歸因爲女性自身的生產力較爲低落，中共在一胎化政策中所表達出的性別語言是否正透露出這種將性別本質化的看法？

第一節 修正的步伐

在一胎化政策中，國家的總體需求和性別意識形態並沒有預先留下父權反撲的空間，我們可以說國家在一開始就沒有考量到一胎化政策將激烈化父權的性別選擇性生育，也可以說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洪流中，不論是政治、經濟、社會的變革都是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試探狀態中，一胎化政策也是如此。國家一開始的忽略父權並不代表它在之後的過程中也不會將父權的影響納入考量之中，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來講，或許一胎化政策正是中國政府的一個機會，經由認識問題的嚴重性而啓動國家去父權化的過程。國家究竟怎樣解讀父權與婦女之間的關係，而要透過怎樣的方式才能解決性別選擇性生育的問題，我們必須更進一步的去瞭解一胎化政策所面臨到的困擾，父權對於一胎化政策的執行造成了怎樣負面

的影響，而中國政府如何去加以解決。

政策的修訂是一個不斷運作的過程，不斷的要企使理想趨近於現實上的可行，同時也讓現實上的障礙磨去當初政策設計上不合理之處。一胎化政策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也是如此「摸著石頭過河」般的去豐富其社會主義人口藍圖的夢想。而其中，特別針對性別人口比例失調以及性別選擇性生育問題去做出補救與改善的，便是 1995 年開始推行的「幸福工程」以及 2003 啟動的「關愛女孩」計畫，這兩者針對的對象或有不同，但是同樣都是要以社會補助或是獎勵的方式提昇女性的地位，同時也能夠促進優生優育、一胎化的進展。這種政治思考設下了一個邏輯，那就是生育的多寡跟女性的經濟發展與生活處境是負相關的，女性生育的越少，經濟發展與生活也會越好；女性經濟發展的越好，生育的數量也會越少。

前一章已提及，這種邏輯原先便已經體現在一胎化政策的每一個步驟當中，其實是國家需求和性別意識形態一樁不甚完滿的婚姻，他們在設想性別處境時，似乎將婦女想像為一單純、中性的勞動客體（就像國家那樣清白、中立），卻忽略了「歧視」、「壓迫」不會只有一方單獨存在。一胎化政策在一開始的想像上是完美的，但是對於性別的理解卻有些不盡現實，這些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在許多性別問題浮出檯面之後正式的受到重視。我們或許也可以說，國家「看見」了父權的障礙。

然而，這並不是說中共一直到 1990 年代才意識到一胎化政策帶來的性別選擇生育激烈化，溺殺女嬰與性別人口失調的問題是一直都存在的，在第一章中已經提及，中國政府高層多次宣示要杜絕溺殺女嬰並保護生育女嬰的母親，但是這些宣示是強烈而短暫的，一直到二十世紀九零年代，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將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設定為發展的重要目標後，人口、資源與環境等

問題都整合為國家發展的一環，並且皆與社會生產力息息相關，至此，生育上的性別問題才開始受到有系統與持續性的關注。在這個新的階段，中國不但要控制人口增長，更要要求人口素質，並且計劃生育工作要和農民的脫貧致富相結合。一切問題都要和生產力相關，在這種馬克思唯物觀論述下，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五中全會中指出，「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把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重大戰略。要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使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迴圈。」²⁷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依然是中國追尋的目標，但是對於現代化的詮釋開始慢慢變得豐富了，經濟發展不是一個單純存在的狀態，它必須和任何環節都有所契合，即便是性別問題也是一樣。當中國提出「可持續發展」作為整體的目標時，這個動作的意義並不只是官樣文章的表演而已，對於人口政策來說，它象徵了中共強烈的意識到生育與貧窮之間的關聯，也就是說再生產與生產之間有絕對密切的關係，不只是訴求一胎化政策將帶來女性經濟地位的提昇，它也要從實際上去提昇女性的經濟地位來促成一胎化政策的圓滿。這便是「關愛女孩」與「幸福工程」兩項行動最重要的基礎。

第二節 幸福工程

所謂的「幸福工程—救助貧困母親行動」是一項特別針對貧困母親的社會活動，由「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所主導，雖然名義上是民間力量集資推廣，但是事實上接受「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指導，並且在人員的編制上與政府相關單位有相當高的重疊性²⁸。因此，雖說是民間社團，但是實際上也是以官辦

²⁷ 朱堯耿，「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人口論的繼承和發展」，中國人口網。

http://www.chinapop.gov.cn/rkzh/rk/rkyjhshyfz/t20041124_17715.htm

²⁸ 基金會首屆名譽會長是前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會長是前全國政協副主席王首道；第二屆會長是前國務院副總理、前全國政協副主席谷牧；第三屆會長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魯麗，常務副會長是國家人口計生委原副主任吳景春，副會長兼秘書長苗霞。2004年11月19日改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魯麗為第四屆基金會名譽理事長，苗霞任理事長兼秘書長，高靜山、

的方式在營運。1995年1月18日，「幸福工程」組委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組委會成員包括多名婦聯常務委員，其目的在於救助貧困母親，主要任務為「治窮、治愚、治病」，治窮是以無息貸款形式扶助貧困母親發展家庭經濟，增加收入，擺脫貧困；治愚是幫助貧困母親掃盲，學習掌握一二門生產技術，以及生殖健康知識；治病是幫助貧困母親檢查和治療常間的婦科病，並提供優生優育、婦幼保健和計畫生育服務（楊魁孚、梁濟民、張凡，1997）。

幸福工程於1995年開始實施，以實施計劃生育的貧困母親為救助的對象，通過「小額貸款、直接到人、滾動運作、勞動脫貧」等方式幫助貧困母親「治窮、治愚、治病」。迄至2006年，幸福工程已經救助貧困母親十五萬四千人，受惠家庭人口數總達六十九萬人，受助對象脫貧率為百分之九十²⁹。而所謂的「小額貸款、直接到人、滾動運作、勞動脫貧」具體來說，小額資助意指的是幫助貧困母親的資金一般在一千到三千人民幣之間，期限一至二年，並且這筆款項直接傳達到受助人手中，受助人名單在當地公共場所公佈，受民眾監督。五年之內該筆資金在同縣市不同受助人間流動不得少於三次，而資金救助的目的應該要能夠促進貧困母親的勞動技能和開發能力，通過自身的勞動增加經濟收入，奠定脫貧的基礎³⁰。

幸福工程的立意是相當明確的，將資源直接灌注到母親身上，以達成優生優育的目標，她的資金來源雖然是來自於各方的捐募，但是也有當地政府提供相同金額的配套資金，以加強脫貧力度³¹。在這當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見到前面所提的邏輯，幸福工程是一個相當明確的案例，它以提昇婦女經濟地位的方式來達成、完滿一胎化的目標。他在資金的發放上要求婦女必須親自到場領款，「這不

于德惠任副理事長。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http://www.cpwf.org.cn/js/default.asp>。

²⁹ 「何魯麗：幸福工程是建構和諧社會的具體實踐」，多維新聞網。www.denews.com

³⁰ 「幸福工程·救助貧困母親行動管理辦法」，中國人口網。<http://www.cpwf.org.cn/xingfu/index.asp>

³¹ 「幸福工程·救助貧困母親行動管理辦法」，中國人口網。

僅是一種形式，救助的本身除了通過經濟方面的資助外，還有更深層次的內容，那就是提高婦女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³²」在這樣的思考中，幸福工程透過生產關係的改變（金錢給予），希望能夠改善私領域的關係。

從此，我們也可以再一次的確認，在中共對於一胎化政策性別問題的理解當中，它是以相同的角度來看待婦女在公、私領域中的身份形貌，既然婦女在公領域當中可以透過經濟地位的提昇來改變自身的地位，那麼在私領域的部份也同樣可以因為針對性的經濟補助而提昇在家庭中的地位。針對實施一胎化的貧困母親做出補助的方式顯示出中共正視到了人口素質養成的過程中，家庭因素所佔的重要性外，它也顯示出中共認為女性在貧困、無知的情況下，是生育多子女的重要因素。因此幸福工程的補助他不但是要改善貧困母親的經濟情況，它也是要透過改善經濟情況來達到少生的訴求，這當中依然不斷的在宣傳相同的理念，那就是生的越少經濟生活就會越好，女性的地位也就越高。

幸福工程的資金給予提供了一種利益機制使貧困家庭傾向於少生，並且也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婦女改變自身生活處境的可能，我們不能夠否認這樣的作法的確是帶來了一些效果，但是當它的重點只針對女性，並且以貧窮無知作為婦女多生育的直接因素時，這種論述仍然是將父權排除在解釋問題的範疇以外。貧窮或者是無知是這些多生育婦女表現出來的普遍共像，但是是否是直接的導因則令人質疑。如果經濟問題可以減輕多生育的誘因，那麼原先生育的目的便是為了生產力，提供給婦女經濟上的補助便是幫助她脫貧、幫助她就業，那麼如果是有經濟能力的婦女是否就不會出現多生育的現象？如果教育可以減輕多生育的誘因，那麼針對這一部份而提供的教育像是避孕等健康知識也應該是男女都必須教育的，而不是只針對婦女。因此，我們是否可以質疑，貧困和無知並不是婦女多生育的主因，正如同富有和擁有較高的知識水準不是婦女少生育的主因，否則便不

³² 「幸福工程項目管理工作有關問題答疑」，中國人口網。<http://www.cpwf.org.cn/xingfu/index.asp>

會出現富裕家庭無視社會撫養費的懲罰而甘願多生育的現象。而當國家認定貧困無知是多生育的主因時，它也顯示了國家只認可以就業方式所提供的生產力而已。幸福工程提供了少生育的利益機制，作為官辦民間團體，它也表現了相當程度的社會與性別關懷，但是對於生育與性別之間的關聯，似乎並沒有提供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解答。

第三節 關愛女孩

2003年5月，國家人口計生委在全國十一個省全面啓動了「關愛女孩行動」的試點工作。（侯文翰，2004）這是繼幸福工程之後第二個與性別問題相關連的社會活動。相較於幸福工程這種屬於較為單純的資源灌注的社會援助來說，關愛女孩活動更能具體的表彰國家對於如何解決現實性別處境的看法，他是較為宏觀的、系統性的由國家下達各單位加以執行，包含文化宣傳、社會保障、節育輔導以及法令的修訂等等部份。

在觀察關愛女孩活動時，有幾點性質值得特別注意，第一點，在執行的動因上，他是和一胎化政策所帶來的性別人人口比例失衡現象直接相關的。2000年，中央決定把“逐步使出生人口性別比趨於正常”作為新時期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六大目標之一。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2003年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指出：「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主要任務是穩定低生育水準，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同時要努力促進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平衡，積極應對老齡人口、流動人口、就業人口增加帶來的問題，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創造良好的人口環境。」

而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一個特徵，便是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人口與自然的和諧，人口結構、人口分佈更加趨於合理，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科技文化素質全面提高和男女地位平等。³³在這樣的基礎上，

³³ 「展開關愛女孩行動的意義」，中國人口網。
http://www.chinapop.gov.cn/girl/bjzl/t20040302_13102.htm

「關愛女孩」的提出便舉有了一種宏觀總體社會政策的意義，

「近年來，我國把人口與發展工作逐漸由控制人口數量轉向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包括人口數量、素質、結構、遷移和安全問題。其中，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是人口結構當中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它不僅危及家庭發展，也將極大地影響和諧社會建設。開展關愛女孩行動，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是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特別是人口結構問題的重大舉措，也是促進社會和諧的具體體現。³⁴」

因為要達到人口與環境、資源等的協調，直接來說，關愛女孩的目的其實就是性別比例的協調，中共設立出一系列優惠女孩與女孩家庭的措施，並且宣示嚴格打擊非法胎兒鑑定以及非法的性別選擇性生育（簡稱「兩非」），並加強對於孕婦的訪察，以避免女孩的非正常死亡³⁵。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共認為必須要自根本上扭轉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消除性別歧視，才能夠真正達到性別人口比例平衡的訴求。

因此，第二點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中共如何消除性別歧視的手段。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在全國關愛女孩試點工作會議上指出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生產力尚不發達，社會保障制度很不健全，特別是在農村，重男輕女的觀念所以根深蒂固，既有傳統文化觀念的深遠影響，也有客觀存在的實際困難和問題，既是勞動力的需要，也是養老的需要。要轉變群眾的生育觀念，就必須使群眾真正感受到“生男生女一樣好”。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發展經濟、脫貧致富抓起，通過建立有利於計劃生育、有利於女孩及其家庭的利益導向機制和社會保障制度，幫助有女孩的困難家庭消除後顧之憂，幫助輟學的女孩回到學校，幫助貧困母親脫貧致富，維護婦女的合法權益，提高

³⁴ 「抓住機遇 扎實工作 肩負起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歷史使命——國家人口計生委副主任趙白鴿在全國關愛女孩行動工作培訓會議上的講話」，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6-10/30/content_7292510.htm

³⁵ 「國家人口計生委關於認真落實全國關愛女孩行動電視電話精神縱談：關於人口性別比例偏高的通知」，中國人口網。www.chinapop.gov.cn

婦女的社會經濟地位，這是“關愛女孩行動”的治本之策。³⁶」

中共在理解性別問題的基礎上，很清楚的，依然是延續之前所提到的邏輯，性別歧視有其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跟生產力相關，因為「勞動力」與「養老」的需要，使得民眾傾向於生育男孩，因此國家企圖積極的建設社會保障制度以及生育女孩的利益機制，提高婦女的社會經濟地位，所謂「治本」。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指出：

「由於目前農村生產力水準還比較低，社會保障能力脆弱，部分群眾想生男孩、多生孩子的願望還比較強烈。要積極探索建立同經濟發展水準相適應、有利於計劃生育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重點對農村獨生子女和雙女家庭進行獎勵，對因獨生子女傷殘、死亡和計劃生育手術併發症造成的困難家庭進行扶助。³⁷」

從關愛女孩的討論中浮現出中共對於性別選擇性生育所瞭解的輪廓，再生產和生產還是直接相關的，因為再生產的結果對生產力水準較低的農村來說，仍然攸關家庭未來的生計。張風雨（1997）也認為農村地區由於社會經濟較不發達與社會保障制度的缺乏，農村夫婦的確有較高的生育需求，同時也會有較嚴重的生育偏好現象。一方面是因為農村孩子可以較早為父母承擔各種勞動，而孩子的撫養成本也比較低，許多農活被認為只有男孩才能承擔，沒有男孩就是斷了香火，因此許多農民「不生兒子不罷休」。顯示在避孕的比例上，最小子女為女孩者，避孕的比例也顯著低於最小子女為男孩者。

這也就是說，農村，特別是生產力水準較為低落的農村，之所以會重男輕女有很大一部份是因為生產力的考量，這一份生產力的考量不只是體力勞動上的呈

³⁶ 「關愛女孩行動：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在全國關愛女孩行動試點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人口網。 http://www.chinapop.gov.cn/girl/ldjh/t20040302_13112.htm

³⁷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要求：遏制男女比例失衡 深入開展“關愛女孩行動”」，中國人口網。 http://www.chinapop.gov.cn/girl/ldjh/t20040412_48969.htm

現，當家庭生育男孩時，它所帶來的生產力具有一種延續性的意義，它可以在父母能夠工作時幫助父母，也可以在父母年老時繼續提供生產力以供養整個家庭。生育已經不是單純的再生產，它經常要被納入生產的考量，我們也許沒有辦法斬釘截鐵的說再生產就是生產的一部分，但是對於再生產的考量卻經常要與生產相關。

李兵、孫永健（2001），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孩子是父母的「生育性財產」，當這種財產轉化為生產性的資本時，便可以為父母帶來一定量的收益。因為中國社會傳統觀念以父權家庭制作為生育態度的基礎，所以男孩跟女孩便被當作不同的財產看待，男孩被視為是共同性的財產，將來會奉養父母、繼承家業與姓氏，而女孩則會從夫而居，故被視為是分離性的財產。這種態度使得父母認為男孩帶來的價值將大於女孩，尤其是在中國農村，對於體力需求的勞動較大，更加强了男孩的價值。而女孩在出嫁前雖然也可以提供相當的勞動與收益，但是當嫁入夫家時，對娘家的提供便有限。因此，如果要解決這些問題，政府不但應當加強對於生育女孩的補助與獎勵，也應該要求男性的所得一半應當流入親家，以此平衡生育男孩女孩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差別³⁸。

這些對於性別與生產力的解釋與中共的出發點是相近的，之所以父母會偏好生育男孩，很大一部份是肇因於現實上的考量，因此，關愛女孩和幸福工程一樣，都是作為一種利益機制增加家庭生育女孩的誘因。於是，第三點，我們可以注意到的便是關愛女孩的執行方式。關愛女孩主要的任務有四點：

1. 利用各種宣傳手段和宣傳形式營造有利於女孩生活、發展的輿論氛圍和社會環境。
2. 研究制定有利於女孩成長和計劃生育女兒戶的社會經濟政策和社會保障

³⁸ 李兵、孫永健，「出生嬰兒性別選擇的經濟學分析」，中國人口資訊網。
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2458

制度。

3. 加強避孕為主的技術指導和服務工作。
4. 貫徹落實《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母嬰保健法》、《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關於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的規定》等有關法律法規³⁹。

關愛女孩活動和一胎化政策所帶來的性別人口失衡是直接相關的，中共希望藉由女性地位的提高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第三點加強避孕的指導以及第四點法令的貫徹等等，很明顯的都是一胎化政策的延續部份，而一、二點則是訴求婦女地位的保障與提高，除了在宣傳方面下手之外，也在實際面經濟社會面向上提供誘因與保障。

關愛女孩行動的對象是獨生女和雙女戶，在實際執行上也包括了女孩的家庭和父母。主要的行動概括起來便是「四有」：獨女戶和雙女戶家庭在「政治上有榮譽」、「社會上有地位」、「經濟上有實惠」、「生活上有保障」。在河南省實際工作的情況將層級的劃分分為五類。計劃生育戶中的貧戶（尤其是獨女戶和雙女戶中的貧困戶）、獨女戶和雙女戶、獨男戶、其他計劃生育戶（包括一女一男戶和二男戶，主要指再婚家庭）、非計劃生育戶（侯文翰，2004）。依照這樣的層級排列下來，以最上層的獨女戶和雙女戶中的貧戶作為優先補助對象。

關愛女孩活動屬於「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的一部分，它希望能夠可以從根本上扭轉傳統的生育觀念，例如說傳統文化偏好生育男孩，除了為了延續香火之外，也是為了「養兒防老」，女兒嫁出去之後便被視為是分離性的財產，不能繼續供養父母。於是，在關愛女孩的政策中便包括了幫助下一代全是女孩的家庭提供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例如說，下一代全是女兒的家庭，在其六十歲之後，

³⁹ 「開展關愛女孩行動的主要任務」，中國人口網。

每人每年可以獲得六百元的獎勵金；生女家庭或是雙女家庭，可以優先獲得小額貸款等等⁴⁰。除此之外，不同地區對於女孩也有不同的獎勵方式，例如貴州地區便獎勵考上省級本科院校的女孩給予一千至五千元的獎勵，若是考上國家「211」大學甚至獎勵一萬元⁴¹。

這些或獎勵或補助的方式都是希望提供較為弱勢的女孩一個可以競爭的基礎，並且當生育女孩不會被視為是「虧本」，反而可以獲取國家更多的保障時，中共希望性別人人口比例的失調也可以因此獲得改善。我們不能夠否認關愛女孩與幸福工程的確為女孩不論是在公領域或是私領域，都帶來了更多友善環境的可能。我們從此可以看出，國家企圖藉由一種經濟上的方式來改善女性的生活處境，雖然有文化上的宣導也有法令上的限制，但是經濟仍然是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去處理這類社會問題的方式⁴²。國家企圖藉由改善女性的生產力（資源的灌注或是教育的補助）來更完善一胎化的結果，從生產關係來改變再生產的關係。

這樣的作法給了我們一個暗示，之所以一胎化會激烈化性別的選擇性生育，原因有兩點，第一點是因為傳統文化的影響，第二點則是因為女性的生產力不如男性，所以國家一方面要提昇女性的生產力，另外則要提供利益與懲罰機制讓育齡夫婦沒有非常強烈誘因（在實際上也無法）選擇性的生育男孩。這樣的生產與再生產論述通常會導引我們朝向一種思考，那就是，性別比例的不平衡很可能與不同地區的經濟規模配置相關，越傾向使用基礎體力勞動的農村，將因為實際上的需要而更傾向生育男孩。人們對於再生產的選擇其實也是來自於生產力的考

⁴⁰ 「人口計生委宣教司司長張建：利益導向將作為國家政策，抑制性別比升高」，[中國人口網](http://www.chinapop.gov.cn)。

⁴¹ 「貴州：幫扶農村計生女孩戶『關愛女孩行動』實施三年成效顯著」，[中國人口網](http://www.chinapop.gov.cn)。

⁴² 關愛女孩的宣傳行動有六項重點，分別為：1. 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2. 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3. 倡導生男生女一樣好的新型生育觀念；4. 關心女兒成長，培養女兒成材；5. 共同關心計劃生育女兒家庭的生產和生活；6. 嚴厲打擊溺棄女嬰、非法進行胎兒性別檢定及引產。六項重點中，前三項及第六項均是舊有政策與法令的重複宣導，唯四、五項為明確的建立利益導向機制方式。「關愛女孩主要宣傳內容」，[中國人口信息網](http://www.chinainfo.gov.cn)。

量，因此，越是需要使用原始勞動力的地區越傾向生育男孩，而沿海地區、城市地區、第三產業發達的地區將因為勞動力的需求不同而減輕性別選擇性生育的情況。在以生產力作為再生產考量的需求下，真正決定的是地區的不同經濟規模而非是父權。

然而，劉爽（2005）以 1990 年和 2000 年的省級數據分析發現，出生性別比與不同省份間的經濟變量並無顯著相關。這很可能有幾種原因，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女性的就業機會較多，並且社會保障制度也較為完善，家庭需求生育男孩的因素減低，但是年輕的夫婦反而因為經濟上的寬裕而有資源去進行胎兒的人工性別鑑定。而即便是快速發達的農村地區，不管是透過鄉鎮企業的模式或是任何可能，富裕的家庭也將會有更強的誘因生育男孩以繼承家業。⁴³

另外，林志斌與邱國軍（2001）指出，在 2000 年的農業普查當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女性比例已達到 77.66%，這表明農戶從事非農生產的比重越大，女性就要承擔更多的農業生產工作，而中國大陸的農村教育近年來培訓主要參加者皆為男性（即使其並不參與農業生產），回家後再將培訓技巧傳授給家中婦女，而這其中經常會發生失真的問題。農業婦女本身素質偏低而又受培訓忽視，除了要向其他產業轉移困難外，只能從事簡單勞動也無法滿足全球化對農業生產者的要求。當農業產值受到國外農產品的衝擊在農村社會中的比重下降，以農業為主要收入的婦女勞動在家庭收入和總產值的比重也會下降。而承擔了更多的生產工作並不等於自主能力的上昇，因為外出勞動的男性仍然是家庭和主要事物的決策者，從事非農務的高經濟產值工作，而婦女只是扮演農務勞動力的地位。而中西部婦女在體現這方面的情況將較東半部更為明顯，因為相對而言，她們的可選擇性較少，不過即使是在優勢農業地區，也通常由男性負責購銷，女性則從事田間

⁴³ 「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告」，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rkldwt/txt/2006-09/26/content_7195332_2.htm

工作。

這些討論很清楚的向我們指明了，第一點，經濟發展的越好的地區並不會減少性別的選擇性生育，相反地，它可能會因為擁有的資源更多而更有誘因或能力去進行。第二點，因為性別而帶來的勞力分工並不是中性的，男性並不會因為體力較好而擔任較為粗重的農活，反而會因為較有資源而擔任購銷等較非直接體力勞動的工作。這是否告訴我們，生產力的考量也許並非是性別選擇性生育的主因，生產也不會直接的影響到再生產，女性減少生育的壓力而投入工作並不一定能夠使其地位提昇，女性的經濟地位改善也不一定就可以不受到傳統文化要求生育男孩的壓力。因為即便女性投入生產，她還是要面臨到生產環境中的性別區隔，當這樣的環境對女性並不友善時，投入工作是否並不等於地位的提昇，反而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剝削其勞動？女性地位、經濟能力、投入生產、優生優育，這些要素之間也許並沒有那麼直接的正向關係，投入生產並不一定就代表經濟能力的提高，也不一定就帶來女性地位的提昇，那麼企圖改善女性生產力是否能夠達到優生優育目的便令人懷疑，在這樣子的情況下，女性是否只是成為減輕了生育壓力的勞動預備軍而已？

第四節 利益機制的目的

當國家需求和性別意識形態之間締連起一個看似完美卻又隙縫滿佈的聯盟時，我們不禁質疑，在這樣的論述中，父權的角色真的可以不存在嗎？國家真的可以不考慮父權的影響性嗎？當國家要進行一胎化政策時，它是否會遇見父權的阻礙，而國家又如何解決？一胎化政策面對到最明顯的障礙便是性別人口比例的失調，從江澤民時代到胡錦濤時代，從幸福工程到關愛女孩，國家對於中國性別人口比例的協調建立了系統性的利益機制，這樣的利益機制希望以經濟上的補助增加家庭生育女孩的誘因，使女孩可以被認為「和男孩一樣好」，而這個「一樣

好」，我們在許多地方可以發現，它指的是「生產力」上的一樣好。

當然，國家也在文化上的宣傳做出了許多的努力，但是沒有實質形體又無限龐大的文化要改變何其緩慢、又何其困難，於是國家在重男輕女的原因上做了一個劃分，一部分是因為傳統文化的影響，這一部份訴諸宣導，而另外一部分是因為女孩被認為生產力較為低下的、較不能養老的，這一部份國家藉由利益機制來加以改善。在國家的總體規劃當中，國家所需求的是一個人口壓力減輕、人口素質提高、男女兩性均衡發展的社會，換言之，人口和環境與資源可以得到協調的發展。然而當要求只能生育一胎時，這便勢必衝擊到傳統父權文化偏好生育男孩以傳遞香火的需要。為了解決這樣的衝突，國家提出了幸福工程與關愛女孩等利益機制希望可以增加生育女孩的誘因，國家給予只生育女孩家庭養老的補助以及其他種種的社會保障與優惠，並且藉由幸福工程將資源灌注到貧困的母親身上。這些都是希望以經濟上的補助能夠改善女性的生產力，不管是母親或是女孩，希望能夠藉由改善她們的經濟生活、提高生產力而提高女性的地位，當女性的地位提高之後，性別選擇性生育的問題也會迎刃而解。

當國家面臨到父權的障礙時，它仍然是以一種經濟的角度希望來加以解決，但是再生產的性別選擇問題可不可以用生產力的改變來加以解決？當國家要提高女性的生產力，當它說「男孩女孩一樣好」時，是和誰一樣好？很明顯的，它指的是女孩和男孩的生產力一樣好。當國家要讓女性的生產力提高，它是否只是以男性標準在看待女性，希望女性也可以達到男性的生產力標準，如果女孩可以達到男孩的生產力標準，那麼就可以消彌掉很大一部份的性別選擇性生育的動機。

國家一方面希望提高女性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則企圖以補助或是獎勵的形式來增加生育女孩的誘因，但是我們也必須要注意到，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其產生背

景是計劃經濟轉型的歷史切口，因此，它必然有許多計劃經濟所帶有的強制性意義，也必然因為政體的轉型而有許多鬆動的環節將連帶的影響到一胎化政策的執行。當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的市場大幅膨脹，公有制雖名為主體，但實際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大行其道時，社會的平均收入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變化。當收入所得差異過大時，對多生、超生所收取的社會撫養費將因為過於富有而無關痛癢，或是因為過於貧窮而無力繳納。（鄭建偉，1994）也正因如此，城鄉的差距變化是否可能使得對於女孩的補助在沿海地區鳳毛麟角，在邊遠地區也杯水車薪？

幸福工程開始於 1995 年，而關愛女孩則啓始於 2003 年，如果這種利益機制確實會對生育偏好有所幫助，那麼在接下來的人口出生性別比中，應該會有所下降，如此便證明生育偏好的重心在於利益，那麼經濟上的利益機制確實是扭轉生育偏好的關鍵。但是實際上的數據並不是如此，在 1995 年之後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大幅攀升到 120 以上（見表一），而甚至是 2003 年實行關愛女孩之後，出生性別比也未見下降的趨勢。所以這是否再一次的證明經濟並不是選擇性生育的關鍵所在。

表一 1985-2005 年 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

出生年份	性別比
	男/女*100
2005	122.66
2003	121.22
2000	117.79
1999	122.65
1998	122.07
1997	120.44
1996	118.52
1995	117.77

1994	116.59
1993	115.21
1992	114.61
1991	113.48
1990	111.39
1989	109.01
1988	108.33
1987	107.55
1986	107.68
1985	107.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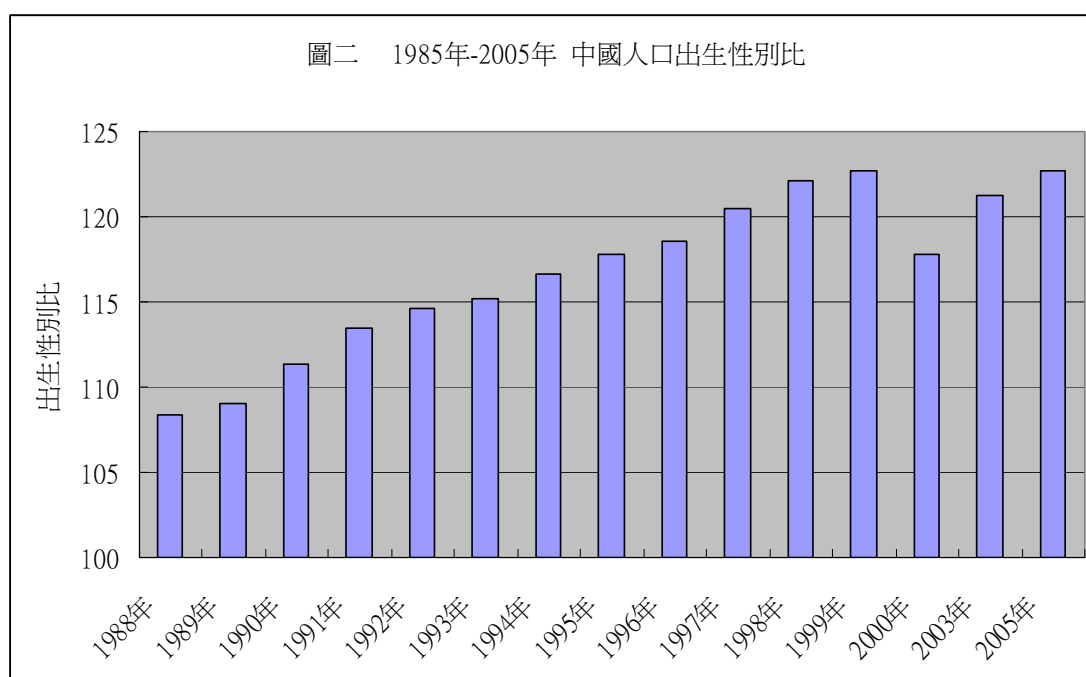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1985年-2000年參考資料為張翼，「我國嬰兒出生性別比在持續上升」，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2-12/24/content_5250870.htm

2003與2005年參考資料為張翼，「我國人口結構的若干重要新變化」，人民網。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4/49156/5239830.html>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當然，我們不能夠否認補助以及獎勵確實有其實質上的意義存在，但是當其基本邏輯是建立在女性地位在於勞動價值的體現時，我們是否需要更進一步的去

檢視勞動市場的環境是否對於女性有益，而國家又用什麼樣的角度來檢視女性有沒有達到勞動的價值？國家到底是怎樣看待女性？

在一胎化政策當中，國家似乎呈現出兩種面向，一方面，它將女性視為是勞動的客體，可以經由工作的過程提昇自己的地位，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將女性視為是弱者需要加以保護。中國像是一個家父長保護女性，但是家父長本身又受到不同的論述拉扯，他要保護女性，於是他要增加女性的利益機制、要增加女性的生產力，但是卻又以男性的標準來看待女性，認為女性「不夠」，而這個「不夠」正是女性地位比較低，被選擇不要生育的重要原因。

當我們嘗試用經濟的角度來設想為什麼家庭會偏好男性，但是事實證明，觸發偏好生育男性的誘因是來自於家庭的觀念，也就是父權的文化影響。女性並不只是單純的勞動主體或是客體，她在再生產上所承載的意義並不只是經濟方面的，事實上，更多的壓力是來自於家庭方面的因素，也就是父權觀念所帶來的偏好。經濟方面的改變並不能完全消除父權觀念所帶來的誘因，男孩依然是傳宗接代的首選，而女孩依然被認為是要嫁作人婦的「分離性財產」，這才是出生性別比例失調的重要關鍵因素，所謂的生產力問題，所謂體力上的考量，其實都不全面，也禁不起論證。在這樣的基礎上，重申要以提昇女性的經濟能力來提高女性的地位雖然不無小補，但是是否會將女性的形象更刻板與片面化，甚至於回頭肯定了女性之前之所以受到歧視，正是因為女性體力不如人，生產力不如男性的緣故。這是否是更將不公義合理化？

國家企圖解決國家需求和父權需求之間的衝突，但是國家用什麼樣的角度來看待女性？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婦女論述的觀點中，是不是男性或女性都必須透過同樣的一條路才能夠得到解放？如果說我們懷疑國家所宣稱的女性「減少生育、投入生產、提高地位」這樣的論述其實只是以男性的標準來看待女性，以女性的

「不足」來合理化女性的處境，那麼在性別意識形態中是否也存在著相同的問題？更進一步的，以經濟或是勞動客體的角度來看待女性，是否就必然會跳入這樣的邏輯？我們必得更進一步的質問，同樣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有沒有這樣的問題？中共的性別意識型態有沒有這樣的問題？在處理女性作為一個經濟的客體或是主體的問題上，它們有些什麼不同？它們是怎樣看待父權，它們又要怎麼避免國家在中立的面貌上卻有著父權的眼睛？